

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及其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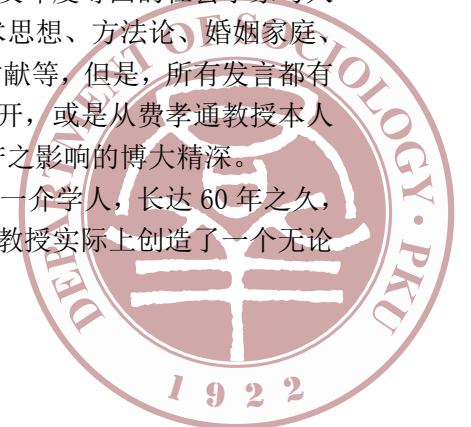
周 星

1996年9月18-22日，我有幸和袁方教授一起，应邀参加了在江苏省吴江市举办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讨论会。吴江会议是由北京大学、民盟中央会同吴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主题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研讨会暨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承蒙袁方教授的特别安排，在这里由我向在座的各位先生，简要地介绍一下吴江会议的情况，同时也多少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与体会。

从1936年的江村调查起，到今年，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活动已经有整整60年了。在这60年的学术活动中，费孝通教授既为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创造了许多珍贵的学术财富，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学术实践又对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农村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样的基本评价，可以说是国家教委、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北京大学、江苏省及吴江市政府负责人的共识，也是与会的200多位海内外知名学者们的共识。费孝通教授以他卓越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但是，对于费孝通教授本人来说，最高的评价或许莫过于他的乡亲们，即那些给他的研究以灵感，从他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同时也是费孝通教授一生“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所要致力于帮助的那些淳朴的农民们的赞许。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考察了吴江市盛泽镇、同里镇以及著名的江村，访问了一些乡镇企业和农户家庭，费孝通教授有关农村工业化、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学术调查与理论研究，就是在当地农村和小城镇发展的实践中，得以展开、验证甚至应用的。众所周知，费孝通教授的学术思想，具有应用社会学与应用人类学的鲜明特征，其本质正像他在其著名讲演“迈向人民的人类学”里所宣称的那样，在于为人民服务。当我们为他的精神所感召，亲临他曾经进行过田野调查的社区时，这样的印象的确是更加深刻了。费孝通教授从不回避他“学以致用”的学术观，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他也非常善于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影响更多的人，其中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们和那些其生活深受国家政策所影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很多人看来，费孝通教授是以他的学术研究和他娴熟的“指导变迁”的艺术，在政府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之桥。

费孝通教授特意为本次研讨会撰写了题为“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的长篇文章，读者们可以从了解许多涉及社会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问题以及费教授本人的立场与观点。在大会及分为小组的研讨中，先后有32位中（含港台）、日、韩、美、英及印度等国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发言，他们的论题十分多样，分别涉及学科建设、费孝通学术思想、方法论、婚姻家庭、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中国文化对未来世界可能的贡献等，但是，所有发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或是围绕费孝通教授60年学术活动的某个方面而展开，或是从费孝通教授本人曾经提出的一些学术命题引申而来，这也反映了费孝通教授学术遗产之影响的博大精深。

那么，纪念江村调查60周年，究竟具有哪些学术方面的意义呢？一介学人，长达60年之久，克服各种挫折，持续不断地数十次跟踪调查同一个农村社区，费孝通教授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无论



在社会学，还是在人类学历史上都十分罕见的学术研究的典范。通过江村，费孝通教授实际上始终跟踪着整个中国的农村社会在这翻天覆地的 60 年间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变迁的轨迹，他把自己的学术建立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上，大家认为这的确是他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不过，费孝通教授的脚步没有停留在江村，相反，他认为一个典型社区的意义，还应该从更为宽阔的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中，在“类型”及“模式”的相互比较中去理解和把握，接着，由江村出发，便有了云南三村、乡镇企业研究、各种发展模式、小城镇问题、边区开发、多元一体等等重大学术命题的延伸。在与会的海内外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们看来，费孝通教授 60 年的实践，不仅在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还为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从而为这两个现代学科在中国获得持久和旺盛的生命力探索出一条康庄大路。

应该说以《江村经济》为代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起点，一开始就显得非同凡响。在人类学史上，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由于《江村经济》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应用到一个具有高度的文明、独特的文字传统和悠久历史的社会，同时，也由于它把传统上以异己的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人类学，引伸到一个以本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为对象的本土人类学的新天地而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费孝通教授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他那里，学术上的执著追求、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都是密切相关而又近乎完美地结合着的。说起费孝通教授学术生涯的起点之高，不由得使我们缅怀起另一位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拓荒者即吴文藻教授。1995 年 12 月 10 日，费孝通教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开风气，育人才”的讲演。费孝通教授详细描述了 60 多年以前，吴文藻教授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所做的不懈努力，可以说，吴文藻教授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设计了详细的规划，他所做的主要有两件事，一件是开中国化之风气，具体地就是通过引进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展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再就是培育了一批人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成就了一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作之一就是《江村经济》。从此，费孝通教授一生的学术实践，都具有这个学派的特色，都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相互亲和的特色。在我看来，费孝通教授的社会学之所以是中国化的，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属性，在于它开创了中国本土的社会人类学，当然也在于它以此为基础有了许多新的创新和发挥。正如费孝通教授在北大讲演时所说的那样，“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实际的重要途径，结合人类学来创建和改造中国的社会学，是我们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工作”。

当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不幸遭遇结束之后，由于费孝通教授本人曾经肩负的重建社会学的历史性责任，也由于他本人的学术魅力，曾经在燕京大学辉煌过一时的那个“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传统，又逐渐得以恢复。费孝通教授在他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中焕发出的创造力以及他的更加具有社会应用意义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恰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的亲和及其茁壮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费孝通教授身先士卒，坚持实地调查，先后发表了《行行重行行》等重要成果，继续和加强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传统；按照费孝通教授本人的要求，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建所十多年来，始终沿着 60 多年前由吴文藻教授等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们所开创的学术方向，坚持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认识当代的中国社会，坚持社会学与人类学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事业的学术宗旨，坚持实证的田野调查，不断实践着在中国具体国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能够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追求。费孝通教授的学术之路，已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一辈的追随者，甚至有不少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以中国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者们，



也都逐渐意识到在其中国研究中结合社会学与人类学两种方法的重要性。我们的体会是，围绕问题或者课题展开社会学与人类学甚至多学科相互结合的研究，尤其在方法上相互借鉴与参照，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使我们受益匪浅。

当然，前述“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非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唯一流脉，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相互亲和的传统，也不是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唯一重要的传统，但是，她之所以富于生命力，除了任何舶来的学科在中国都不能回避中国化的问题之外，还因为以费孝通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坚持不懈地实践着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中国社会与文化，并且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成就。她当然不是一个自视“正统”而排除其他“异端”的传统，相反，而是一个尊重不同的研究风格或学说流派的传统，因为在人类学的基本命题里原本就包含着“美人之美”，即对于“他人”及其文化的尊重。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优良的传统，理应得到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这个传统是在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这个传统的复活及其重新振兴所具有的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重建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由于与外部世界的阻隔时日已久，所以有必要迅速引进各种国外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包括半个多世纪以前早已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所熟悉的那些古典理论与方法的重新引进，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法要被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工作者应用于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自然就面临着如何使它们在中国得到验证之类的问题，于是也就自然存在重新中国化和继续中国化的问题。基于此，社会学与人类学若要在最终摆脱舶来的属性，或者说要建设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中国学者想要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则社会学与人类学在中国相互亲和的传统，就是值得我们重视和选择的。

学术界纪念吴文藻教授和费孝通教授这些学术大师的学术活动及其成就，主要是为了继往开来，使我们能从老前辈那里学习和继承到他们的学问的精神、学风以及人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前辈大师那里，或者由于历史时代方面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个人的学术际遇、专业背景甚至个人兴趣，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民族学往往是不分彼此的，他们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也与此种学科观不无关系，应该说这种状况与我们今天所处的学术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珍视并提倡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亲和，也并不是要与学科专业分化的倾向背道而驰，而只是想学学科的分类固然令人尊重，但科学或学术往往却不宜被人为的分类所禁锢。我们或许应该对由我们自己建构的学科分类壁垒有所反省，从而恢复从其他相邻的姐妹学科获得“他山之石”的勇气。如果我们在学科间筑起高墙，以学科的名义排斥或拒绝与其他知识交流，那就难免出现“学者”在学术界制造“社会问题”的局面。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本文是作者1997年4月17日在北京市社会学学会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书讯

- 1.《西藏的人口与社会》，马戎著，36.6万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定价：22元。
- 2.《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著，17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定价9.50元。
- 3.《西藏社会发展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34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价格待定。（有意购买者，请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情报资

